「個體中國」三卷本總序

個體時代的來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過去四十餘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深刻而持續的轉型。制度改革、市場擴張與社會分層重組改變了資源配置與權力結構，也重塑了家庭關係、人生路徑和情感秩序。在這一宏觀變遷中，一個至關重要卻常被低估的事實逐漸顯現：個體被一步步推到社會生活的中心位置；個體的選擇、責任與命運，逐漸成為時代運行的基本單位之一。

在既有社會理論中，個體化是以福利國家制度、個體權利擴張與古典個體主義價值觀為前提的現代性新發展。然而，中國的路徑有所不同。改革以來，個體化是在強國家主導下，以經濟增長為目標，通過制度改革與社會關係重組而逐步推進的社會轉型過程。其間，個體獲得了更大的行動空間，卻未同步擁有充分的制度保障；責任不斷下移，風險在相當程度上被私人化。與歐洲理論所強調的「制度化個體主義」不同，中國的個體在權利制度尚未充分建構之時，便被推向自我負責與自我承擔的前台。主體性的形成因此呈現出一種結構性懸浮狀態。結構為個體鬆綁，同時也迫使其在新的不確定性中不斷為自身行動尋找支點。社會結構與個體能動性之間的張力，構成中國個體化時代的基本邏輯。

本系列三卷本正是在這一問題意識下展開的長期研究項目。我並不著力於探討抽象的個體主義價值觀或者個體化理論，而是具體聚焦於社會的結構轉型如何塑造個體，個體又如何在結構約束中展開行動。系列既考察制度鬆綁與個體脱嵌的歷史邏輯，也分析家庭的全面重組與主觀世界本質性變遷的具體實踐，分別在結構生成、關係式再入嵌和個體主體性三個層次展開論述，以層層遞進的方式，考察個體時代的來臨及其特點。

作為先行出版的第二卷，《新家庭主義興衰：中國私人生活的重組，2000–2025》聚焦於家庭這一中介層面。在風險累積與制度保障不足的背景下，家庭要重新承擔起吸納風險與調節資源的功能。新家庭主義既在回應不確定環境，也在責任過重時顯露內在張力。家庭強化與家庭祛魅並存，支持與負擔交織，呈現出個體化深化過程中的複雜結構。

從同一核心問題出發，第一卷《鬆綁與脱嵌：1990年代的中國式個體化》回溯至個體化的結構性起點，分析制度改革如何通過「鬆綁」與「脱嵌」的雙重機制，將個體變為經濟實踐的自主行動者。在這一階段，個體首先是承擔責任與追求機會的拼搏者，尚未開啟其主體性敘事。

第三卷《進退維谷：當代中國個體的崛起與困境》則進一步推進至個體的主觀世界。當個體真正成為社會生活的核心單位之後，他們如何理解自身處境？在高度競爭與成功導向的環境中，他們又如何建構自身意義？尤其在Z世代中，自我覺察與情感修復的「內在性轉向」成為回應結構壓力的重要方式。這一轉向在為個體提供新的表達語言的同時，也在不自覺中持續內化結構性困境，迫使個體在賦能與重負之間長期徘徊。

貫穿三卷的，是長期民族誌調查與歷史追蹤所積累的經驗觀察。從農村改革到城市化浪潮，從獨生子女一代的教育焦慮到數碼平台時代的情感表達，普通人在時代變遷中的跌宕與沉浮間構成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個體化進程最真實的底色。個體並非宏大敘事中的抽象符號，而是那些在制度鬆動中抓住機會、在競爭壓力下承受焦慮、在家庭責任與個人意願之間反覆權衡的具體生命。個體的崛起不等於個體的凱旋，而更多呈現出個體被置於歷史前台之後的制度性困境。正是這些經驗，使個體化成為可以被感知、被記憶、也被反思的歷史過程。

「個體中國」三卷本試圖呈現的，正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整體圖景：結構如何塑造個體，家庭如何調節個體，個體又如何在責任集中與意義焦慮中尋找自身位置。中國的個體化，並非價值觀層面的個體主義擴張，而是結構層面的責任再分配與風險私人化。在制度支持尚未穩固、社會風險持續累積的條件下，個體面對的是一種需要不斷為自身行動尋找支點的懸浮處境。個體時代已經到來，但其邏輯與悖論仍在展開之中。理解這一過程，不僅是把握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與主體經驗關係的關鍵，也是看見日常生活中默默承擔時代重量的普通人的開始。

閻雲翔

2026年2月於洛杉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的資料

序

私人生活變革的意義

吳小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閻雲翔教授要出新書的消息已在坊間悄悄流傳了一陣子，或許這也算不上什麼新鮮事。自2009年閻教授榮獲美國列文森圖書獎的著作《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中譯本在中國大陸出版以來，他不僅躋身國內社會學、人類學必讀文獻的作者之列，也成為在大學課堂、講座海報和學位論文頻頻出現的名字，並時不時被大眾傳媒追蹤和訪問，其筆耕不輟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這位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教授的名字對國內同行來說並不陌生，更可以說是近15年來國內社會學與人類學圈最具傳播度、最受歡迎的海外華人學者之一。尤其在中國社會日益走向個體化的今天，作為個體化理論在中國社會的闡釋者，其思想和學術影響力正在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不斷擴大且從未中斷。

用「網紅教授」來定義已近古稀之年的閻雲翔，或許並不那麼準確，儘管他的粉絲遍布華人世界。尤其對於中國內地的同行師生來說，每年夏天5至6月份閻雲翔歸國授課、講學的季節，已經成為很多文科大學生翹首以盼的「知識更新節」。人們期待著這位遠在西半球、卻未曾落下國內正流行的電視劇和網絡熱詞的知名前輩學者，能不斷帶來有關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全新思考和敘述，而閻雲翔也

的確從未讓人失望過——即使他的觀點在學界和坊間從不乏爭議。這也正是他作為50後一代學者的魅力所在——有人稱之為「知青代」，而我更願意稱之為中國的「最後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個人或家庭曾遭遇的經歷帶著傳奇色彩，鐫刻著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和文化變遷的深刻印記，成為中國現代性敘事的一部分。而他們就此所積累的豐富閱歷和練就的敏銳覺察力，也早就超出了技術層面的知識水準或能力的評判標準，幻化為思想上的一種「嗅覺」和道德上的一種意義追索。如同十年前閻雲翔在接受內地一家媒體採訪時所說，他所關注的中國社會私人生活的變革以及個體化轉型，其落點在於當代中國的道德變遷，而這種道德轉型與現代性對中國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的評價緊緊聯繫在一起。正因如此，閻雲翔將研究的核心放在「私人生活的變革」這個議題，但又遠遠超越了關於私人生活探討的慣常邊界，帶給我們寬闊的、深邃的、流動的現代性敘事。

本書被閻雲翔界定為繼二十多年前以黑龍江下岬村為田野的私人生活研究的「續集」。如果說當年基於東北農村鮮活日常的研究，讓長期被遮蔽或誤讀的中國人的私人生活在西方主流學界「被看見」，那麼如今聚焦於全球化時代的Z世代青年和家庭轉型困惑的「私人生活變革2.0」版，則試圖為當下中國人的私人生活變革構築起嶄新的敘事框架。因此本書所賦予的私人生活變革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變革背後的中國人或中國家庭，更在於變革本身所呈現的現代性的整體畫像。所以接到閻教授讓我寫序的邀約，作為一名後輩倍感榮幸和惶恐。

我跟閻教授相識於十多年前，一個在浙江良渚召開的有關個體化與私人生活變遷的小型研討會。當時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海外教授，但他為人謙和，虛懷若谷，對知識探索始終懷有熱忱與好奇心；在學術交流中，更展現出罕見的坦誠與毫不留情的自我反思精神。這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後大約是2015年，我所在的家庭研究室想要舉辦一個關於個體化與家庭的小型圓桌會，便冒昧

香港中文大學中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給閻教授寫信發出邀請，沒想到閻老師欣然應允。那次會上閻雲翔做了一個激情洋溢的演講，儘管他謙遜地認為自己不是專門做家庭研究的，但我們還是驚訝於他對家庭各種點滴變化的敏銳把握和對國內相關中文文獻的熟悉，彷彿身處其中從未離場。在提問環節他澄清了關於「無公德個體」等概念的翻譯和誤讀，也談到了「代際親密性」、「社會自我主義」、「新家庭主義」等提法，這些在他的後續研究以及本書框架中都做了更加詳盡的闡釋和延展。近五年來我們之間有了更加頻繁的互動，通常都是我們這邊通過郵件邀約閻老師講座或賜稿。有時他也會在英文新作剛出爐，或是尚在腹稿階段的中文寫作有了新的思路時，便第一時間發過來交流討論。閻教授對於學術的赤誠、田野的嚴謹、故土的拳拳之心，以及對學者之間無論資歷深淺平等以待，尤其樂於跟年輕人（包括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敞開心胸、無設防求證的姿態，都令人感佩。

從個體化到新家庭主義的興起：傳統的輪迴？

本書的副標題「中國私人生活的重組，2000–2025」，很好地呈現了此書與《私人生活的變革》之間的關聯性：所處時代／時間上的前後接續，以及所關注的世代上的跨越——從80後到00後。這種動態追蹤的、歷史透視的眼光，正是閻雲翔有關家庭和私人生活研究的重要特點，區別於領域中常見的橫截面經驗性研究。它將個體的境遇放在時代的洪流中，表面上在描述一代代人的生活和觀念變化的細枝末節，但背後從未離開對那隻「看不見的手」——推進社會變革的宏大之「勢」——的體察和追問。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中，閻雲翔聚焦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個體之崛起」這個新趨勢，體現在「私人生活的雙重變革」，即家庭的私人化以及家庭成員個人自主性的增長，以及這種個體化趨勢（儘管那時還沒有明確使用「個體化」這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保有版權的資料

概念）的形成機制的探討。而在本書中，個體化的脈絡並未中斷，而是貫穿始終，並以「新家庭主義」的多元、矛盾的複雜形態呈現出來，構成私人生活變革的2.0「升級版」。在這個「升級版」中，閻雲翔試圖探討為何在今天的中國，家庭的重要性「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領域同步上升」，而「新家庭主義」成為承載這種私人生活變革的公共性含義的獨特概念工具。

有趣的是，近十多年來也恰好是國內學界家庭研究的旨趣和範式發生重大轉向和明顯分野的時期，出現了家庭研究的「尋根熱」和「重返傳統」的取向，與此相伴的是家庭主義在傳統文化旗幟護佑下的高調復蘇，以及面向家庭個體化和原子主義的種種質疑，由此個體主義和家庭主義兩條主導脈絡下的研究範式及相應的學術共同體也在某種程度上越行越遠。因而自2018年閻雲翔借用「新家庭主義」作為分析視角描述中國家庭的新一波變遷以來，儘管之後幾乎每一篇論文、每一次講座都在圍繞這一概念試圖作出進一步論證、闡釋、細化和深挖，有關閻雲翔的思想「走向個體化反面」的傳說還是不脛而走，甚至有人視之為滑向家庭主義保守陣營的信號。也就是說，從個體化到新家庭主義的興起，是否意味著一種「傳統的輪迴」？這一疑問本身顯示了國內家庭研究分析框架日漸走向多元分化的現狀。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是，21世紀以來，隨著個體和家庭日益進入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和不安狀態，中國家庭研究的學者們也將更多的關注點從家庭內部的衝突或失衡，轉向家庭自身「分而不散」的內在機制或邏輯，從對「變」的敏銳感知轉向對「恆常」的持久追問。無論這種新的問題轉向名之曰尋找「家庭韌性」，抑或是「社會底蘊」或「社會基礎」，「新家庭主義」都被順理成章地理解為其中一環。

然而這大概是家庭研究界最大的一個烏龍，因為新家庭主義的興起在閻雲翔這裏從不意味著傳統家庭主義的復興或「個體化趨勢的逆轉」，而是個體與家庭之間互動關係的複雜呈現。本書中閻雲翔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然並未對國內近十年來的這種傳統轉向及其範式分化做出直接回應，不過通過〈導論〉關於新家庭主義與傳統家庭主義之間異同的比較、上編關於新家庭主義在實踐中的多重面相的漸次打開和多維度分析、下編有關知識論和方法論意義上對私人生活領域的探討，都不難看出他的新家庭主義與那些「傳統復甦派」(姑且這麼稱呼)的一個最大不同，是其關注點仍在於家庭的變遷而不是延續的面向。他相信「變遷」已經成為風險社會的一種生存策略，相比「延續」更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因此新家庭主義並不聚焦於家庭的「韌性」或「恆常」，而是家庭內部個體化與代際團結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張力」。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閻雲翔將新家庭主義首先理解為一種幫助年輕人對抗風險、追求幸福的「工具性手段」，他用「親子一體」觀念基礎上的「代際親密性」來解釋當下中國家庭內部普遍存在的代際依附與共生現象，揭示了家庭在「由道德等級秩序轉化為跨代情感同盟」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即興發揮」的演繹策略。這種新家庭主義圖景「充滿悖論和不確定性」，充其量可能只是一種過渡性的策略。正因如此，閻雲翔才會在〈結論〉發出「新家庭主義何去何從」的追問，而這也提供了「以私人生活為方法」理解中國現代性轉型的關鍵鑰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家庭的「祛魅」與新家庭主義的式微：「發現」青年的脆弱性

近年來閻雲翔一邊致力於將新家庭主義進一步概念化和系統化，一邊開始探討新家庭主義的可持續性問題。這是因為在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成長起來的Z世代(在中國內地更多稱之為95後、00後)的橫空出世，不僅僅改變了網絡這個虛擬空間的呈現方式，也悄然重塑了包括家庭在內的現實世界。在如數家珍般地分析了「婚育並非人生必選項」、「人生是曠野，而不是軌道」等網絡流行

語之後，閻雲翔發現，伴隨著Z世代青年話語的流行和家庭的「祛魅」，新家庭主義的式微或許很難避免。

與《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樣，本書一如既往地關注家庭內部「雖然『倒置』卻依舊『核心』」的代際關係變遷，但一個顯著的不同是從原先更多聚焦變遷給父母一代以及主流社會帶來的震盪和不適應，轉向如今更多關切變革本身帶給年輕一代的主體感受。因此在作者的筆下，同為以追求個體幸福為己任的年輕人，從以往那種可以在個體化的路上狂奔的「無公德個體」，蛻變成如今在父母的勉力支持和權威回歸中努力「做自己」而不得的「脆弱」青年。在本書的分析框架中，有關代際關係的描述也從強調家庭資源和重心單向下移的「下行式家庭主義」，變為更加強調家庭代際合作和雙向互動、秉持「中性」立場而不帶倫理預設的「代際親密性」、「後父權代際性」等概念。不過儘管閻雲翔一再強調「代際性」作為一個概念化工具的價值中立特點，它自身所具有的動態性和主體性視角，卻體現出典型的青年立場。

事實上，對於Z世代青年以及話語的關注和深層剖析，成為本書一個不可忽略的亮點，行文間很容易感受到作者對於青年處境所抱持的同情之心，同時對青年文化和話語的悅納甚至驚歎常常躍然紙上。可以說，青年的「發現」是本書的重要特色之一，這種發現不僅僅在於青年的「被看見」，也包含青年的「被懂得」。如第三章通過父母包辦離婚的故事講述探討了代際親密性在青年這裏如何既抵禦了風險、又削弱了個體自主性的雙刃作用；第六、七兩章通過對Z世代青年的自主生活選擇和各種「祛魅」性話語的精彩分析，探討了他們如何以看似「非對抗性」的方式，成就了「家庭祛魅」這樣具有革命性的新家庭主義「轉捩點」，同時又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疏離與療癒的雙重機制來踐行「做自己」；而第九章關於組成本書分析框架的十個概念工具中，至少一半是與青年直接相關或者帶有明顯的青年取向的，包括後父權代際性、原生家庭、情感價值及其風險、擴展青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春、「她力量」等。尤其關於Z世代的「擴展青春」的幾個維度分析中，閻雲翔敏銳地抓住了這個世代所特有的「內在性轉向」，把它與當前席捲中國的心理學熱、以及原生家庭話語和「療癒式自我」的流行結合起來，揭示了當代青年口口聲聲想要追求的主體性和本真性，在缺乏強有力的道德支撐的背景下日益淪為內在體驗和情緒價值的脆弱性，以至於「創傷」、「療癒」、「自我關懷」等成為這個時代流行文化的關鍵字。因而反過來也可以說，本書所揭示的Z世代青年的脆弱性和生成中的療癒性自我，也是他們重塑主體性的一部分。在不斷窄化的「做自己」的敘述中，「主體性」這一艱深的哲學詞彙，正在成為互聯網上最流行的自我表達和獨立姿態。而本書中關於這些概念在學理層面上的討論和釐清，將帶給讀者更深層次的思考和啟發。

由此看來，發現青年的脆弱性是與發現青年的主體性密不可分的，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面對網絡上流行的「恐婚恐育」、「不婚不育保平安」、「重新養育自己」等等青年話語，就不會覺得多麼反常識，而是會理解為當下青年處境與文化的自然結果。閻雲翔在書中將視婚育為一種個人選擇而非人生必選項的理念轉型，稱之為一種「代際頓悟」，認為它承載著非同尋常的道德份量。通過將家庭從一種「天命」的神聖位置拉下來，重塑為一種平凡的生活「選項」，Z世代青年的「曠野人生」信仰推進了家庭「祛魅」的最終完成。與此同時，隨著新家庭主義的工具化，它日漸成為「功能上堅韌、意義上脆弱」的充滿內在張力和悖論的體系，也就是說，新家庭主義在表現出驚人的「韌性」的同時，也時刻面臨著自身解體的危機，如情感的正當化動搖了家庭的固有秩序，也削弱了新家庭主義得以存在的根基。因此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新家庭主義培養出了自己的掘墓人，Z世代青年在享受新家庭主義帶來的功能性支持和托舉的同時，對其內在張力和極限也有著深刻的感知，因而成為拒絕舊式家庭腳本、嘗試「做自己」的新腳本的「覺醒」一代。這意味著新家庭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義作為一種富有爭議性的應對策略和兜底機制，儘管不會一夜之間驟然崩塌，但也難以持續保持昔日風光，而終將走向自我消解的結局。這大概也是本書的書名《新家庭主義興衰》的由來。

以私人生活領域為方法：被忽略的現代性分析框架

閻雲翔在〈導論〉開篇提到了本書的三個主旨之一，是提出私人生活變革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為本土家庭理論的建構盡綿薄之力」。實際上探尋適合本土的家庭解釋框架、建構本土的家庭理論，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家庭研究學者的痛點以及努力方向。特別是近十多年來伴隨著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本土化浪潮的日益高漲，以及國內家庭研究的重新復蘇甚至火爆，各種本土家庭理論建構的嘗試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一本與一體」、「直系組家庭」、「功能性家庭」、「馬賽克家庭主義」、「個體家庭」、「權變型家庭」、「流動性家庭」等等。然而這些關於中國本土家庭以及家庭理論的探討和分析，無論是主張重返傳統文化挖掘本土的歷史資源或嘗試作出重新闡釋，還是主張尋找西方不斷更新的家庭理論與中國複雜多元的家庭實踐之間的契合點，往往都很難走出經典的家庭主義與個體主義之爭。而閻雲翔的新家庭主義試圖在這兩條脈絡之間找到一條穿越與連接的通道。如在作為分析框架的十大概念工具中，無論是情感驅動的「親情倫理」的道德正當性，還是作為防禦和應對機制的「演繹策略」，都突顯了風險社會中個體與家庭之間合作共生的功能性、靈活性和策略性。不過閻雲翔也指出，新家庭主義下的個體選擇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性的應對策略，也是通過自我性的文化建構尋求生活意義的過程，而基於中國傳統的「關係式自我」的邏輯，構成了其文化根基。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除了探尋中國本土的家庭理論，肖瑛等國內學者也積極宣導以「家」作為方法構建中國社會理論，認為「家」作為根基性的隱喻支配著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邏輯，使之成為把握文明總體的關鍵要素。不過這一類的「家」，通常所指的並非實體意義上的家，而是作為社會的情感和道德支點之一、以隱喻的方式存在的「家」，常常作為現代性的另類拯救者出現。而閻雲翔所指的新家庭主義的「家」，則是融合了所謂實體和想像、集結了家庭關係與理念上種種變革、充滿煙火氣的家。在下編的方法論章節，作者特意強調本書依然沿用了早年的私人生活變革作為研究視角，也就是說家庭在這裏並非作為方法，它的重要性只因它處在私人生活領域的核心，因而成為私人生活變革的「重中之重」。作者同時也指出，私人生活領域並不限於家庭，在中國的文化和政治語境下，它既是透視公共性變革的視窗，同時也是個人主體性的生成空間，因而具有獨特的重要性。閻雲翔將這種重要性歸結於中國與西方社會相比迥然不同的現代化路徑——私人生活領域變革在前、公共領域變革在後，而不是相反。這種路徑的差異賦予中國私人生活研究獨特的方法論意義，因此中國的個體化可以是韓國學者所說的「無個體主義的個體化」或者「家庭導向的個體化」，而中國家庭的私人化往往表現為與公共領域隔離或脫嵌的「自由的私人化」，國家成為私人生活領域邊界的塑造者和決定性力量，並且能夠以介入私人生活領域的程度和方式重新定義「政治」和「道德」的含義。

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以私人生活領域為方法，是中國現代性分析的一個重要框架。遺憾的是，這種分析框架在西方主流敘事中常常被忽略，因為現代化被視為「離家出走」的過程。同樣，國內學界關於轉型社會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討論中，也鮮有將私人生活的視角作為重要參照的傳統。但如今當國家的觸角越來越多伸向公共和私人生活領域、當家庭越來越成為社會治理的核心幹將之一、當注重普通人的生命史和個人體驗的口述史成為人文社科研究中的流行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方法，面對今日以「主體性」為口頭禪的Z世代的全新世界，以私人生活的變革作為出發點，其方法論的價值不言而喻。這與另一位廣受歡迎的海外華人學者項飆所主張的「把自己作為方法」以及對於日漸消失的「附近」的關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也是讀者可以從本書的閱讀中細細品味到的作者的一番深意。

文字至此，已近2025年歲末。一如往年，網上各路媒體正在盤點過去一年的新聞、熱詞和熱梗，看到「愛你老己」(這裏的「老己」是對自己的暱稱)上了好幾家青年網絡熱詞榜單，被稱為年末「最溫暖的梗」。而一家流行刊物的2026新年獻詞，也赫然寫上了這樣的標題：「看見世界之前，先看見自己。」換句話說，什麼時候我們看見了自己，才能更清晰地看見世界。我想閻雲翔教授也一定會喜歡這句話。

2025歲末於北京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自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本書的最終定稿可以說是兩起意外事件所帶來的「無心插柳柳成蔭」。起初，本書以《新家庭主義的興起》為名，原計劃於2019年底完成。但兩件變故突如其來，不僅打亂了這一計劃，也部分改變了研究的方向，帶來有關「新家庭主義何去何從」的新思考。

首先，新冠疫情的爆發，使我不得不取消原定於次年的田野調查並暫緩寫作，以便重新核實若干關鍵信息。其次則是Z世代青年意外地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中心角色。我最初被他們在網絡上關於「婚姻恐懼」和「生育焦慮」的熱烈討論所吸引，繼而意識到這一代人出現了一個深刻的「世代頓悟」，即「婚育並非人生必選項」。第六章和第七章將深入探討這一現象的意義與影響；在此僅可略言，Z世代的行動與思考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新家庭主義的發展道路，也重塑了當代中國私人生活變革的邏輯。事實再次印證了那句老話——上天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也會打開另一扇窗。因此，雖然這本書多用了五年的時間才得以完成，我毫無遺憾。

在長期的學術生涯中，我逐漸形成了一種個性化的民族誌研究方法。我總是先用英文做田野調查筆記，交替使用中文和英文來分析收集來的資料，然後用英文寫作。即便最終目的是以中文出版，我仍習慣以英文撰寫初稿。這樣的雙語交替操作實踐，使我能夠在

「近身理解」(intimate knowledge)與「價值中立」(韋伯意義的value-free)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始終保持從邊緣處觀察和思考。對於一位研究自身文化的本土人類學者而言，這種平衡和邊緣位置都十分重要。

與那些先學習中文再來華研究異文化的美國同行不同，也與從小無間斷地學習到博士階段的青年學者不同，我的人類學道路是一個反向歷程。我並非先在研究生階段掌握理論工具，再去尋找社會現實加以應用；相反，我的長期田野點是黑龍江省下岬村，這是我從17歲到24歲(1971–1978)期間作為普通村民生活與勞動的地方，也是我懵懵懂懂度過青春年華的道德共同體。在1978年之前，我所接受的正規教育止步於小學五年級；在中年之後，我才到異國的學術環境中學習人類學知識，然後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重新發現與詮釋它。

1989年重返下岬村進行長期田野調查時，我首次體會到自己的非典型尷尬境地。本以為有了人類學訓練的加持，我能夠以「局內人」的身分順利地研究和書寫自己的文化——但其實不然，這恰恰喪失了人類學強調從「他者」的視角研究異文化的優勢。我比其他進入異文化研究的人類學家只是多了一個便利，那就是不需要當地知情人的牽線搭橋帶我進入田野，以及對當地生活方式的熟悉；但我缺乏的是人類學家不可或缺的敏感性和客觀視角。因此，我不得不重新了解這些早已熟知的社會景觀和人際關係，學習如何與熟悉的鄉親們相處相知。最初，我經常感到沮喪，認為我所記錄的日常生活細節似乎毫無社會意義；它們不過是普通人的生活經驗，而且與我在1970年代作為村民時的親身體驗差別不大。此後每一次回鄉，這種尷尬的心境雖不再如第一次那麼劇烈，卻總會或多或少地讓我一次次體會到它所帶來的困境。然而，恰恰就在這種反覆的困惑中，我偶然發現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即兼用英語作為我的工作語言，局面才有所改觀。

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從初始田野調查回來後與我的導師、哈佛大學的華琛教授(James L. Watson)共進午餐時的一幕。他以慣有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略帶調侃但又嚴肅的口吻對我說：「雲翔，我一向覺得，做老師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把學生『推』進田野去，因為那是成為真正的人類學家的第一步。但聽完你講的故事後，我現在擔心的是怎樣把你從田野中『拉』出來了！」

我立刻明白他所指的「拉出來」是要我重新找回學術分析的客觀距離；而他之所以無需「推動」我進入田野，正因為我生來就在那個田野之中。我回應說，我的體驗不太一樣。我在田野初期感到束縛與無助，根本無法進入狀態。直到我用英語把自己先「拉出來」之後，才能真正進入田野。雖然用英語記錄村民的語言和生活讓我感到極其別扭，常常找不到合適的表達方式。但奇妙的是，通過這一外語的透鏡，我所熟悉的一切都變得陌生起來。熟悉與陌生之間的轉換，讓我獲得了新的觀察視角。我最後也半開玩笑地對導師說：「你別擔心，我在村里時就把自己『拉』出來好多次了。」從那以後，我始終依靠這種雙語並重的視角，在人類學實踐中保持著共情與距離、情感與理性之間的合理張力，並從中獲益匪淺。

將原本的英文稿變為中文出版，不僅僅是翻譯的過程，更是一場思想的重構。幸運的是，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我遇到了極其重要、可遇不可求的合作者陸洋博士。她的工作遠遠超出了翻譯的範疇。她細緻地編輯了整部書稿，逐一核對了所有關鍵的引用與史實，並與我進行了無數次富有啟發的學術討論。她對學術卓越的堅定執著、嚴謹踏實的工作方式和完美主義精神，使我深受感動。本書能夠呈現出今日的面貌，陸洋博士的貢獻功不可沒。謹此表達我最深切的敬意與感激。

我還想借此機會再次懷念摯友胡延軍先生。我們相識於1971年的深秋——我到達下岬村落戶的第二天。從那之後，我們之間建立的友誼歷久彌深。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伯樂，在我窮困潦倒的時候看到並相信我的能力，盡可能幫助我適應當地農村生活，並在我1978年長期曠工準備高考時為我提供了最關鍵的支持。自1989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年以來，在我先後15次返鄉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他不僅以其深厚的地方知識協助我的研究，更以其獨到的智慧啟迪我對人生的理解。對我而言，他既是無話不談的老友，也是指點迷津的田野導師。2023年，他與世長辭。囿於疫情，我們沒能見上最後一面，這是我無法彌補的個人損失。謹以本書紀念我們跨越半個世紀的友情。

在過去數十年的研究中，我還得到了下岬村許多朋友的幫助與支持。我特別感謝胡延軍的已故兒媳王國雲，她既是我重要的訪談對象，也在每次駐村時為我提供悉心照料。我還要感謝下岬村的朋友和鄉親伊孝忠、胡曉輝、王振波、胡春雨、車桂敏、胡延波、程金燕、徐家軍、楊長軍、范垂珠、夏重高和已故的畢樹珍。他們的熱情和友誼不斷加深我與下岬村的情感紐帶以及對研究課題的理解。胡延波在1990年代末精心繪製的當地房屋結構圖，為我2003年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在此一併致謝。

在學術界，我特別感謝康嵐、吳小英、李甜、鍾曉慧和富曉星等國內學者，和石瑞（Charles Stafford）、戴慧思（Deborah Davis）、威廉·揚科維亞克（William Jankowiak）、華琛、華若璧（Rubie Watson）、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與魏樂博（Robert Weller）等海外學者。他們或閱讀了部分章節並提出富於洞見的評論，或就書中的關鍵觀點與我進行了富有啟發的討論；其中，康嵐的貢獻尤為顯著。這本書能夠請到吳小英撥冗作序，我深感榮幸。我特別感謝研究助手鄭海儀在田野調查中提供的重要支持和對有關Z世代的章節草稿提出的問題和評論。此外，我在中國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報告有關Z世代的研究成果時，也受益於來自學界同行與熱情的青年聽眾們的大量評議。這些來自學術共同體的寶貴反饋，是我得以不斷改進書稿的關鍵因素，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樂趣之一，特此致謝。

在此，我謹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致以誠摯的謝意。自本書構想醞釀以來，她始終給予穩定而堅定的支持與信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使本書得以在專業而從容的出版環境中順利推進。同時，我深深感謝本書的編輯袁載俊博士與陳沅宜女士。在出版與製作的各個階段，他們以嚴謹的專業標準與細緻周到的工作方式，為本書提供了周密而高效的協助。與如此專業且敬業的編輯合作，是一次值得珍視的學術出版經驗。

最後，我衷心感謝程月輝女士和李經浩、李煥英伉儷，他們的慷慨資助使這項跨越多年的研究項目得以順利完成。

謹此感謝相關出版社慷慨授權，允許我在本書中使用本人既有研究成果的修訂版本或部分內容。第一章的大部分內容曾以"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Family in Rural China"為題，發表於《邊界2》(*boundary 2*)，第38卷，第1期(2011)，頁203–229。第二章大量借鑒了我此前發表的民族誌材料，原文"Intergenerational Intimacy and Descending Familism in Rural North China"發表於《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118卷，第2期(2016)，頁244–257。第三章的早期版本"Parent-Driven Divorce and Individualiza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Youth"曾發表於《國際社會科學雜誌》(*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第64卷，第213/214期(2015)，頁317–330。第四章改寫自"Love for a Child: Parental Advocacy for Social Inclusion"，收入貝琪·楊·許(Becky Yang Hsu)主編的*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Mundane: Family and Forms of Community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5)，頁22–65。第五章是在"Familial Affections Vis-à-Vis Filial Piety: The Ethical Challenges Facing Eldercare Under Neo-Fami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基礎上修訂而成，曾發表於《中國社會學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第10期(2023)，頁1–21。最後，第十章為"The Statist Model of Family Policy Making"的修訂版本，原文收錄於閻雲翔主編的*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Brill, 2021)，頁223–252。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